

目 录

中译者序.....	1
-----------	---

第一卷

前言.....	1
导言.....	13
材料的抄袭.....	17
字母的对音法.....	21
拼写与读音之差误.....	30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37
伊本·库达特拔.....	37
《道里郡国志》.....	39
伊本·马萨维.....	50
苏莱曼.....	51
《编年史一览表》.....	51
雅库比.....	64
《阿巴斯人史》.....	64
伊斯哈克·本·伊姆朗.....	70
伊本·法基赫.....	71

伊本·罗斯特	82
《珍宝志》	82
穆罕默德·本·扎卡里雅·拉齐	98
阿布·泽德	100
《关于中国、印度和闾婆格城的第二部著作》	100
阿布·杜拉夫·米萨尔	107
马苏第	109
《黄金草原》	110
《税制考》	126
伊本·塞拉皮翁	128
《药性论》	128
穆卡迪西	130
《书信录》	131
穆塔哈尔·本·塔希尔·马克迪西	132
《创世与历史》	132
阿布尔·法拉吉·穆罕默德·本·伊斯哈克	135
《书目》	136
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	154
《印度珍异记述要》	154
阿维凯奈	179
比鲁尼	180
《印度志》	181
《东方民族编年史》	185
伊本·利德万	187
伊本·瓦菲德	188
哈拉基	189

埃德里奇	191
《诸国风土记》	191
伊本·图法伊尔	217
雅库特	219
《地名辞典》	220
《简本地名辞典》	251
《同名地名辞典》	252
伊本·巴伊塔尔	254

第二卷

卡兹维尼	323
《世界奇异物与珍品志》	324
《各国建筑与人情志》	338
伊本·赛义德	346
阿布·奥玛尔·明哈吉·丁	391
纳西尔·丁·图西	396
《瓦萨夫史》	398
拉施特	400
迪马斯基	402
努伟理	436
《阿拉伯文苑》(《极需》)	436
阿布尔菲达	440
《地理书》	441
哈姆杜拉赫·穆斯多菲	448
《内心的喜悦》	448

伊本·瓦尔迪	451
《奇迹书》	452
伊本·巴图塔	472
《伊本·巴图塔游记》	473
伊本·哈勒敦	512
《绪论》	512
巴库维	516
《关于考证强大国王古迹和奇迹的书》	516
马克里奇	520
《劝善与尊重》	521
阿卜西希	523
《新鲜故事集》	523
《诗文集》	526
阿卜德·拉扎克	528
伊本·伊雅斯	531
《世界各地珍异物香味书》	531
《异国游记》	541
西迪·阿里·赛赖比	542
《海洋》	544
阿布尔—法兹尔	612
《阿克巴尔纪要》	613
米尔扎·穆罕默德·卡齐姆	629
《奥朗泽布武功纪》	630
萨迪克·伊斯法哈尼	633
《阿拉伯语语法研究》	633
《地名辞典》	635

《波斯文辞典》	637
几部没有注明时间的文献	638
《一千零一夜》	640
《一百零一夜》	644
《印度珍异记》	649
增补	671
花刺子米	671
伊本·尤努斯	671
比鲁尼	678
《马苏德天文表》	679
《星相学书》	682
阿布尔-法德尔·贾法尔	686
卡兹维尼	691
吉奥巴里	692
西拉齐	697
努韦理	700
附录: 汉文、日文、泰米尔文、爪哇文和马来文文献选	715
求那跋摩行纪	717
义净	719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719
《南海寄归内法传》	721
金刚智游记	722
鉴真	723
贾耽	726
坦焦尔碑	728

周去非·····	743
《爪哇史颂》·····	736
《波斯王朝史》·····	766
《亚齐帝国的领地》·····	770
索引·····	775

中译者序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编译和校注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是研究八——十八世纪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的一部名著。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向达和冯承钧诸先生都非常重视它，予以介绍；许多其他学者也曾零散地使用过其中的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此书始终未能全文译成中文与我国学者见面。我们现在不揣谫陋，将全书译出，以飨我国读者。

由费琅辑注的此书出版于本世纪初（1913—1914年）。从那时以来，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对于西域南海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这部著作中的部分观点已略显陈旧。但它毕竟仍有自己的学术价值，因为书中搜集了八——十八世纪大量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人的原始史料，它们对于今天的科学研究仍是非常珍贵的。今天来看，费琅的不少考定也颇有过时之感，但不失一家之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由于我国学者对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原文资料不易见到，而这些史料又是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史必不可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把它译成中文还是很有必要的。

西域南海地名相当复杂，对音考证也相当困难。中外不少学者都曾对此作过大量工作，但又往往各持己见，形成了诸家纷注的局面，许多问题至今尚难稽考成定论。我们在翻译成中文时，对于那些现已考证清楚的地名，我们尽量

机会同各民族、各人种的海员取得联系；这些海上人对我叙述的生动情节帮助我懂得了伯佐尔格(Bozorg)船长在其《印度珍异记》一书中所谈到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印度珍异记》一书中可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II 1859年，在塔朱拉湾(Tadjoura)，我们驻亚丁的领事被杀害之后，以朗贝尔(Lambert)船长为首的一艘战船被派到索马里(Comalis)各港口，搜寻并惩处凶手^①。能否抓到真正的杀人凶手我不知道，但数目可观的扎伊拉(Zayla')的索马里人却被逮捕，并被装上战船运到法国。在布雷斯特(Brest)和土伦(Toulon)关押了一段时期后，一些人死去，另一些虽然还活着、但已气息奄奄的俘虏被送回到各自的家园。

1882年，我结识了他们之中一个名叫萨马特·奥卡(Samater 'Oka)的人，作为索马里人，他性格极为开朗，对自己曾带着脚镣完成的行程，无论是对从扎伊拉经好望角到布雷斯特的旅行，还是对在法国监狱的经历，都没有丝毫的坏印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讲述者，他向听得目瞪口呆的同胞们讲述着一些惊险故事，声称这些故事是他在欧洲逗留期间亲眼看到的，或者他本人就是故事中的主角；他绘声绘色地叙述着，吹嘘着他在欧洲亲眼看到的怪人怪事。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格言：远方的和尚会念经。有一天，在扎伊拉，他当着我的面讲到，当他经过布雷斯特和土伦——这是他记忆中仅有的两个地理名字——之间的某地时，他看到那里的居民都是人身狗头。他还大胆地请我证实这是

^① 参看费琅：《关于哈拉尔帕夏及其属地之政治、贸易和宗教状况之评注》，载于《东方地理学会会刊》，南锡，1886年第1季度，第7页。

真实的。因为我否认欧洲有他所说的狗头猴，萨马特发誓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并说他亲眼看到还亲手摸了摸这样的怪物；而尽管有我的抗议，听众们当然还是相信萨马特是对的。几天以后，萨马特来看我，很友好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想当众承认自己的国家有狗头人，但你知道，我并没有凭空捏造什么：我曾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人，而你自己也认识他们。”争论无休止地进行着，然而却是徒劳无益的；但看起来，萨马特非常坚信在布雷斯特和土伦两城市的郊区的确有狗头猴存在。 III

1895年讨伐马达加斯加时，我正在马任加(Majunga)，讨伐队的全部殖民军在这里下船登岸。当海员和士兵们对某些马达加斯加官员的名字和附近的地名熟悉了一点并多少懂了一些当地日常用语时，他们便把这些名字应用到他们的风趣中去，一般是以双关语的形式出现的。胡瓦(Huva)地区总督名叫拉玛苏姆巴扎哈(Ramasumbazaha)，他们说成“收拾好你放乱的东西”(Ramasse ton bazar)；马卢瓦依(Maruvuay)地区总督的妻子名叫朗扎米特尼苏瓦(Randzamitenisua)，他们说成“整理你的丝绸手套”(Range tes mitaines de soie)；在当地，相当一法郎的货币发音为“莱姆比朗扎”(Raimbilandza)，他们说成“白女王”(Reine blanche)；马任加港进口处，有一个村庄叫卡柴坡(Kaçepe)，他们就和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名字——土伦附近的塞拜角(Cap Cépet)混为一谈。在十七世纪的一本游记里，人们还可以发现，一名法国海员曾提到马达加斯加西北海岸有一个塞拜角，如果不知道这里指的是马达加斯加一个村庄的名字，要考定这个海角对现代地理学家们来说将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在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研究过去游记中所出现的地名时，肯定也会有类似的转写字；但在缺乏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则永远也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和阿拉伯文献一样，当我们得到某一东方词（一般是易错的词）的唯一写法时，就很难对该词进行考定；同时，很多地名还仍然是一些难解的谜。同样，不仅对东方地理书的作者或抄写人员，而且对欧洲的出版商和翻译家来说，某些同形异义的词都是铸成讹误的另一个原因。最明显的例子是闍婆格一词，现在的发音是 Zabadj，过去的发音是 Zābag < Djāwaga < Java 和僧祇一词，过去的发音是 Zang，现代的发音为 Zandj，即非洲东海岸，但这两个词在使用时往往是相互混淆的。这里指的是位于印度洋两端的两个不同地方；但阿拉伯人接受托勒密对印度洋的看法，把这两个地方搞到一起去了，这是构成错误的又一个根源。

有时候，某一巧合或难以预料的不利情况，即人们平常说的“不谋而合”，也可能把一些地名用阿拉伯文转写成近似同一的、同形异义的或近似同形异义的形式，有时说成是近邻，有时说成是位于印度洋两岸。比如，有两个哥谷罗 (Kākula)，一个在印度支那东部，另一个在马来半岛西海岸。马来半岛西海岸这个哥谷罗与中国文献中的个罗 (Kala, Kula 和 Kulo) 相近似，与阿拉伯地理书上的个罗 (Kalah)，与托勒密地理书上的塔乌拉 (Τάχωλα) 以及法国地图上写为克拉 (Kera) 地峡等是相似的，所有这些名字均是同一个词或发音相似的词。吉蔑 (Khmer)，一般写成 K·Mār^①；科摩罗 (马达加斯加) 岛通常写成 Komr 或 Komor；尼罗河的

① 在 K·Mār, Ć·N·D·R, S·N·D·R 等转写中，“·”表示前边的辅音在文中没有元音化。

发源地、非洲东部的月亮山，人们有时使用 *ḵamar*，即月亮，有时用马达加斯加的阿拉伯发音 *ḵomr*。因此，人们往往把由 *ḵ*, *m*, *r* 等同样音素的吉蔑、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洲混为一谈。在印度西海岸，有一地名叫索发拉(*Sofāla*)，在非洲东部也有一个叫索发拉的地名；然而幸运的是，阿拉伯的作者们把这两个地名用印度的索发拉和僧祇的索发拉的方法区分开来。最后还发现，在印度洋里有三个瓦克瓦克(*Wak-wāk* 或 *Wāk-wāk*)：一个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在马达加斯加，一个在非洲东部。另外，从这三个同形异义、同形异地的地名还可以引导出一个日本古老地名的汉文形式，发音为“倭寇”，字义的意思是倭国，古时的发音为 *Wo-ḵwak*，这就出现了四个同音异地的地名。

所庆幸的是，东方的记载忠实地显现了中国、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地名。如果说阿拉伯文献中的地名有时出现某些修改，是由于阿拉伯文献不是按地名本来的发音读出来的。因为疏忽，人们没有把某些现象复原到过去的发音，而是一向错误地沿用以往的发音。因此，*Zābedj* 中的字母“e”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发音在阿拉伯文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第二个元音，应该读作 *Zābadj*。这一地名指的是西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区。而字母 *Z* 在该地区所有语言中都是找不到的，因此只能起一个转写的作用。在这里，阿拉伯文里的摩擦音实际上表示印度尼西亚的腭音 *dj*，这是在现代阿拉伯文中的作用。但因为阿拉伯文字母 *Z* 的发音相当于印度尼西亚 *dj* 的发音，因此不可能出现腭音，而 *Zābadj* 来自 *Djābadj* 一词，则是阿拉伯文中的摩擦音字母 *j* 腭音化了。所以，*Zābadj* 的读音是错误的。我们确切知道，*j* 是古

代的喉音,后来腭音化了。在闍婆格一词中,字母 z 起喉音作用,所以不应该读作 Zābadj,而应该读作 Zābag,这一点是无需置疑的。通过语音比较而充分证实了的这一新的读音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中国的文献为这一解释作了决定性的印证: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以喉音为结尾的事例。比如,“岛屿”一词,现代的发音为 Djuzr,但通常写作并读作 Dju-rz。正像闍婆格一词中的字母 Z 一样,同时起着喉音和摩擦音的双重作用,可以转写成腭音 dz。因此,岛屿一词可读作 Guzr=Guzra=Gudjra,来自梵文的 Gurjara,指的是印度一位叫瞿折罗的国王。再比如, Djurzān 一词,过去发音为 Gurzān,来自波斯文的 Gurdjān^①。在后面的数页里,vi 还有一些新的读法可以确定某些国家、某些城市、某些民族等的具体方位。

我经常翻阅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1904年版,载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卷,第131—413页)。从我所引用的很多章节里可以看出,为了研究远东的地理,中国史料中提供的情况是多么重要。一般来说,阿拉伯当时的地理学家们没有到过印度以东的国家,相反,中国人却通过向汉人纳贡的使臣,或通过中国派往恒河流域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使节,与那些被他们称之为蒙昧民族的地区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细心地记载了搜集到的有关这些蒙昧人的情况;同时也用汉文的对音形式记载了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名。总的来说,汉文的对音形式更准确,更具有

^① 见马夸特(J. Marquart):《伊朗古城考》(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语言历史类,柏林1901年版,第3卷,第2册,第115页)。

一贯性。伯希和在评论贾耽所经路线时，汇总并翻译了中国文献的大量章节，从而使这些材料远远超出了一个汉学家的范围。同时，伯希和还正确地指出了如何对待施古德(Schlegel)的《地理评注》一书以及如何解决某些其它需要鉴定的内容。《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的作者对中国所具有的渊博知识以及他天才无误的评论，得到了应有的称赞。我认为，《两道考》一书是继雷诺(Reinaud)的《东方学家地理书综述》之后，对远东地理文献研究中最权威的著作。这位卓越先驱的论文集是和他的这一著作紧密相关的^①。

在研究某些外国地名的汉文记载时，伯希和准确地以古时常用字的发音作为其考定地名的基础。我从这些复原文字中和其它一些专门为我准备的内容中汲取了很大的教益。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最遗憾的是缺少一份完整的古代汉字发音。学习一定数量的汉字对一个称不起汉学家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进行古代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对认识的某些字只有在会古代发音的情况下才可能多少有点用处^②。因此，非常希望能有一位汉学家制定出一个必不可少的汉文对音表。这一实际困难很可能是造成这方面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但这也正是我要专门呼吁的，希望法国研究汉文的机构对此能引起重视。

① 同时还可参阅关于伯希和的另外两篇论著：第一篇是对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的译注文；第二个是《扶南》（第3卷，第248—303页），均以《关于印中的汉文文献》为总题目载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

② 辨认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使用的梵文地名的方法，正像他指出的那样，是专门用来辨认梵文名字汉文对音的。

在其《托勒密关于东亚地理之研究》(印度和印度马来半岛)^①一书中,格里尼(Gerini)自称在这一重新开始的工作中,一部分地理方面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我并非同意其看法,相反,我却同意戈岱司对格里尼《研究》一书的考定意见。关于阿拉伯作者们提出的某些外国地名的读法,请看格里尼的例证。他说:“在阿拉伯文献中,占婆(Čampa)也读作 Šenf、Zenf、Šenef、Zenef 等,甚至还可能读作 Šanf 或 Zanf; 但从未读作 Čanf。”这是不确的。占婆一词,只有两种读法是正确的:古代的发音 Čanf 和现代的发音 Šanf。过去的音素 Č 相当于梵文的音素 c, 这一点已被梵文地名 Campā 的词源所证实,而且也被其它的词例所印证。此外,格里尼还在其著作的末尾加了这样的注释:阿拉伯文的 Š=Z=Č。这一等式是正确的,其中的摩擦音已被排除。

又比如,昆仑岛(军突弄)从字义上看是 Š·ND·R, 古时的发音为 Č·ND·R+fūlāt, 应该读作 ČUNDUR+fūlāt; 现代的发音为 ŠUNDUR+fūlāt, 即 poulo Condore。格里尼先生说它位于海南岛,并补充说:“总之, Šender-fūlāt (原文如此)很可能表示 Candra-upala、Candra pulina、Candra parvata 以及梵文的 çona-parvata、汉文的丹戎武嘞 或某些类似的词(原文如此)。在此期间,格里尼先生从《印度珍异记》一书中认为开头的两个音节 Šandā-būlāt 和 Šidā-būlāt 是错误的,并在补遗部分提了出来,指出 Š=Z=Č, 并指出两种新的考定:“……因此,很可能是 Candāpura 和 Candanapura。”故 Š 和 Z,“从来不表示 Č”(第 243 页),然而却

① 见《亚细亚学报》第 10 套,1911 年版,第 17 卷,第 378—387 页(关于《研究》的书评)。

相当于梵文的 *c* 和汉文中 *t*。人们非常想了解发音规则以证实这些奇怪的相互交替。《研究》一书的作者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其一，他认为只对托勒密的地图作某些数字上的修改即可；其二，他断然否认有相互比较的语言存在。当人们想从词源学上接触同一地名的梵文、希腊文、阿拉伯文、汉文等的写法时，就会明显地发现，如果知道当地地名的发音，就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或以已被证实为最准确的对音为出发点，严格建立各个语种之间不同音素的对照乃是非常必要的。前面的例子说明，格里尼先生是根据“差不多”的想法进行研究的。按照他的说法，阿拉伯文的形式 *fulāt* 或 *būlāt* 可能代表梵文的 *upala*、*pulina*、*parvata* 或 *pura*（岛屿），而且可以代表汉文的对音“普罗”。最好的证据是，梵文的前三种形式与汉文形式是毫不相干的，也就是说，*Cundur-fulāt*（昆仑岛）一词第一次在唐代的汉文中出现时，*upala*、*pulina* 和 *purvata* 写成当时的汉文发音应该是巫山（*Wou-polo*）、蒲里噜（*folino*）、婆利岛（*Polofato*）等等，由此看出，这三种形式不但和“普罗”无任何相似之点，而且和 *fulāt* 或 *būlāt* 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实际上，阿拉伯文的形式相当于马来文中的 *pulo*，即在“岛”字的后面加上波斯文的多数后缀 *-āt*。阿拉伯的作者们只不过是再现了一个波斯化的马来词，而与梵文毫无关系。对《托勒密关于东亚地理之研究》一书的大部分对照可以提出同类的异议。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对发音的比较所取得的成果给予特别的重视。过去的地理学家们提供的关于某一海港，尤其是某一岛屿的标记常常是错误的，因此也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海岸图与实际情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希腊人看

来,印度洋只不过是一个关闭的死海;在阿拉伯人看来,地中海则是中国的海域;且所标出的经纬度均是错误的。总之,当托勒密或某一位其他的地理学家把这样那样的港口或岛屿标明位于这个或那个港口或岛屿的北部,这个岛与那个岛有多大的距离时,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要看一眼托勒密地图、埃德里奇地图或儒莲出版的中国地图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在这种不确切的情况下,如果阿拉伯文资料和汉文资料与某一当地地名发音是一致的,即使阿拉伯文文献和汉文文献指的港口或岛屿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相同的,也可以作出同一地名的结论。同样,当外文的转写X不符合两种语言之间相互交替时,提出这样一种考证方法将被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一些地理论著的作者们注意到了这一基本道理,那么,大量的错误就会避免。当然,语言学的研究不可能解决地理学方面提出的所有问题,但首先应该避免那些无用的推测以及那些似是而非的假说,这样,一种控制的方法即可树立起来。

我们这部著作分为两卷:第一卷为两章,包括丰富的文献译文和必要的注释;第二卷为第三章,首先提到的是有关阿拉伯人对地球形状的观念、地球上的区域分布及气候情况、阿拉伯人的地图绘制以及他们把印度洋分为七个海的依据等;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已得到解决或找到解决地理问题新方法的附录;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方位已定的城市和地区等各种情况梗概的附录。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大多数经纬度是不准确的,然而也为绘制这个地区的地图提供了方便。只有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们所确定的方位绘出地图之后,我们才能够对他们

想要表达的观念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因此，我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这些地理学家们提供的情况和地理的实际情况作一模棱两可的对照，便载入当代的地图中去，而为了找到那个时代东方世界的概念，应该本着忠实于当时海岸、江河、岛屿等的写法进行重新绘制。当然，这一复原肯定要比现代地图的内容多得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且对古代文献也会解释得更为确切。我积累了一些有用的个人经验，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地图的绘制并出版这项研究成果。

引用其它著作的所有阿拉伯字和汉字，根据这部著作的规则均用转写的形式重新转引，而没有考虑原著中使用的写法。

有关阿拉伯、波斯、突厥等作者的传记评注，对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的专家们没有多少用处，而主要是为那些尚且称不上伊斯兰东方学专家的人们才重新编写的。

第三章后面附有一详细索引，并有补遗和更正。

最后，我要感激法兰西学院的西尔万·列维 (Sylvain Lévi) 和伯希和两位教授为我提供了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全部情况，并为我作了极其宝贵的更正。我还要感激我的朋友、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戈德弗鲁瓦—德蒙比纳 (Gaudfroy-Deimombynes) 教授，感激他帮助我翻译或收集最早用法文出版的大量译稿。

G. 费琅 (Gabriel Ferrand)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五日于柏林



导 言

〔我所掌握的伊斯兰东方文献共有五十八种之多，其中有四十六种是阿拉伯文著作，十一种是波斯文著作，一种为突厥文著作。除此之外，我还要补充五种汉籍译文，一种日文著作，一种泰米尔著作，一种卡韦文(Kawi)著作，两种马来文著作。但其中仅仅有两种伊斯兰东方文献是真正的游记故事。〕其一是大约九世纪中叶苏莱曼在印度和中国的游记，其二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后，阿布·杜拉夫·米萨尔·本·麦哈黑尔从不花刺(Bokharā)出发去中国，途经印度、马来半岛、交趾半岛等一些港口之后所写的游记。《印度珍异记》一书的作者伯佐尔格船长游览了印度，可能也游览了印度尼西亚，不过他使用的大部分材料是以一些没有名气的海员所述为依据的。马苏第(Mas'udi)似乎没有到过远东：无论是《黄金草原》还是《税制考》都没有一个章节提到过。比鲁尼(Biruni)、突厥海军司令西迪·阿里·赛赖比(Sidi 'Ali Čelebi)和波斯人萨迪克·伊斯法哈尼(Sadik Isfahani)等也没有越过印度。至于伊本·巴图塔(Ibn Baṭūṭa)在恒河流域的印度和在中国的游记则更为奇怪，我们应该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把这一游记看作是作者编造或抄袭来的，因此也就没有很大价值；《一千零一夜》和《一百零一夜》的作者并非有名；其他一些作者如伊本·法基赫(Ibn al-Faḳīh)、

伊本·罗斯特 (Ibn Rosteh)、穆卡迪西 (Muḥaddisī)、阿布尔—法拉吉 (Abū'l-Faradj)、伊卜拉希姆·本·瓦西夫王 (Ibrāhim bin Wāṣif-Šāh)、哈拉基 (Kharakī)、阿卜西希 (Abšihī) 等对我们来说都是生疏的, 或了解甚少; 伊本·图法伊尔 (Ibn Ṭufayl) 是一位哲学家; 雅库比 (Ya'qūbī)、拉施特 (Rašīd ad-dīn)、瓦萨夫 (Waṣṣāf)、伊本·哈勒敦 (Ibn Khaldūn)、阿布尔—法兹尔 (Abū'l-Fazl) 等是历史学家; 阿布·泽德 (Abū Zayd)、埃德里奇 (Edrīsī)、雅库特 (Yāqūt)、卡兹维尼 (Kāzwinī)、马格里布人伊本·赛义德 (Ibn Sa'id)、努韦理 (Nuwayrī)、阿布尔菲达 (Abūlfidā)、伊本·瓦尔迪 (Ibn al-Wardī)、巴库维 (Bākuwī)、伊本·伊雅斯 (Ibn Iyās) 等是编书匠; 伊本·巴伊塔尔 (Ibn al-Bayṭār) 是植物学家; 伊本·库达特拔 (Ibn Khordādzbēh) 是邮政局长, 他的职业为他和旅行家们接触提供了方便, 并从中得到有益的情况。总之, 在上述所有关于东方著作的作者中, 到过恒河流域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苏莱曼 (Sulaymān)。苏莱曼游记的真实性是无可非议的, 另外我们还有锡拉夫 (Sīrāf) 的阿布·泽德的宝贵证据, 泽德曾在公元 916 年阅读这本游记并且作了补充。

- 2 我认为, 在建立并发展波斯湾各港口和远东之间的海上关系方面, 人们无疑夸大了阿拉伯人的作用。看起来, 阿拉伯人很可能沿着波斯人开辟的航线旅行过, 从波斯人那里获得“船长 (nākhodzā)”^① 一词的写法, 并用同样的拼写、同样的含义写进阿拉伯文。(同样, 也请参阅波斯文中的 Čin Kelān, 即相当于梵文中的 Mahācina, 意为“摩诃支

① 该词由 khodā (主人) 和 nav 或 navah (船) 组成。

那”，大中国，大秦），伊本·巴图塔在其游记中即用此词来指广州。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伊本·巴图塔游记》第4章，第92页以下的段落：“人们仅仅在中国的刺桐城或摩诃支那（即“秦阿秦”）才修造这样的船舶。”在同样一部著作第272页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资料。我们在1375年绘制的卡塔卢尼亚文地图集中也曾发现标有 Čin Kelān（广州），但这一文献的出版者们却误将此名考订为暹罗（Siam）。详见布松（J. A. C. Buchon）和塔斯图（J. Tastu）：《皇家图书馆古写本部第6816号特藏——1375年卡塔卢尼亚文画本地图集考释》，载1841年的《提要 and 摘录》第14卷，第2期，见第142页。

在 Čin Kelān 的问题上，拉施特在其著《拉施特史集》〔*Djami el-tévarikh*，布洛赛（Blochet）版本，第2卷，1911年伦敦版，8开本，第493页〕中称：“第九省（Šēng）便是奈勒奇（Gūlgi?），大食人称作 Čin Kelan。这是位于海滨的一座很大的城市，地处刺桐以下，同时也是一个重要港口……”布洛赛先生在一条注释（第494页注②）还补充说：“B号和La号手稿中的两种说法同样也可能是正确的，其一指出该省府位于海岸，地处刺桐以下；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该城与刺桐位于同一海岸线上。”伊本·库达特拔认为是 Baghbūr，马苏第^①和阿布尔菲达认为是 Faghbūr，乃波斯文 Baghpūr 一词的阿拉伯文形式，意思是上帝的儿子，从汉文“天子”一词翻译过来的。阿拉伯文献中出现的下列地名，如迪巴贾特（Dibadjāt）是拉克代夫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的统称，胡斯纳米（Khošnamī）是安达曼群岛（Andaman）

① 见《黄金草原》第2卷，第200页。

海域里的一座山名、昆仑岛相当于 poulo Condore, 属于波斯文地名拼写的范畴。迪巴贾特一词相当于“岛”(来自梵文的 dvīpa 和巴厘文的 dīpa), 后面再加上波斯文复数后缀 -djāt, 即为群岛。胡斯纳米是波斯文 Khoš (惬意的) 和 nāmeḥ (名字) 组合而成的, 从字义上看是说(山的)“名字令人愉快”, “有良好的预兆”。Fūlāt 是一复合词, 词中的 Fūl 来自马来文的 pūlo 或 pūlaw, 即“岛”的意思, 再加上波斯文复数后缀 -āt 而成。Čundur fūlāt 是昆仑岛, 但阿拉伯人不知道 fūlāt 是群岛的意思, 也许是因为忘记了的缘故, 所以把“岛屿”一词就称作瓜岛群岛。桂皮一词在阿拉伯文里叫作 dār čini: dār 在波斯文里是“木”的意思, 即中国木或中国出产的木。波斯文里的核桃 (djūz) 一词被阿拉伯作者们写成远东和印度的多种水果的名字, 诸如肉豆蔻 (djūz buwa), 迪奥戈·德·库托 (Diogo de Couto) 把这同一种水果称作班达核桃, 还有的称作印度核桃、椰子果等等。阿拉伯人称呼东非以及黑人居住区的名字, 过去的发音为 Zang 或 Zangi, 现代发音为 Zandj 或 Zandji, 也同样是借用了波斯文的 Zang 或 Zangi (僧祇) 一词。最后, 中国人称阿拉伯人为大食, 同样也是从波斯文的 Tāzi 或 Tadjik 对音来的, 因此, 是波斯人把过去他们自己给阿拉伯人起的名字传到中国去的。在我看来, 这一有决定性的考证说明波斯人是最先进行海上航行的。

从四世纪末到七世纪初, 中国历代王朝的史料把交趾半岛、锡兰、印度、大食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的产品统统称为“波斯货”, 说明这些物品是从波斯运到中国的^①。

① 赵汝适:《诸蕃志》译本(M.F.夏德和W.W.柔克义译注), 转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中，中国法师义净说他是于公元671年从广州乘波斯船去佛逝即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淳林邦 (Palemban)^①的。据《贞元新订释教目录》记载，金刚智大约在公元717年从锡兰出发，有三十五只波斯船从行，驶向苏门答腊的淳林邦，然后前往中国^②。

我们没有当时阿拉伯船只前往中国的证据，故只能相信，在公元九世纪以前，海上的航行首先是波斯海员完成的，他们是阿拉伯人远东航行的开创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波斯人这些航海方面的游记，我们一本也没有。〔巴托尔德 (W. Barthold) 先生在对夏德和柔克义译注的赵汝适之《诸蕃志》的书评（载《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论丛》第21卷）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很想把自己的著作寄给我。在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我非常同意这位深孚众望的俄国东方学家的高见。〕

材料的抄袭

在大部分情况下，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们是原封不动地抄袭先驱们所提供的材料。某些人这样叙述他们的材料来源：埃德里奇在其导言中指出了所使用的著作；卡兹维尼则更进一步，他直接把引用某一作者的段落放在前边；伊本·赛义德转载了一个叫伊本·法蒂玛的人的某些片段，而我们却不了解伊本·法蒂玛的材料又从何处而来；阿布尔菲得堡 1912 年版，第 7 页。“当得到这部著作时，我的手稿已经脱手，但我尽可能在我的手稿中增加了该书中有用的内容，或者加了注释。”

① 通常写法为 Palembang，我使用的是当地的拼写方法，其字母 ñ 由 ng 代替。

② 见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第 336 页及注③。

达又大量引用伊本·赛义德的著作，另外一些人则是索性不要脸面的剽窃者。伊本·法基赫从苏莱曼游记中节录的下面一段就是明证^①：

苏莱曼在 851 年

4 I. (第 17 页) 马斯喀特、扶南和哈尔干(孟加拉湾)之间约行一月。在扶南, 他们加了淡水。

II. 然后, 开始启航, 进入哈尔干海。越过该海, 便是婆鲁师。该地居民不懂阿拉伯语, 也不懂商人们所讲的其它语言。他们赤身裸体, 不穿衣服。据说, 没有见过他们之间有女人。因为外国人到来, 都是男人乘独木舟离岛过海去见他们。(第 18 页) 他们带着椰子、甘蔗、香蕉、椰子露。椰子露呈乳白色。饮时取自椰壳, 味甘甜, 似蜂蜜。放置少许, 成为饮料, 若存放数日, 则变为醋。他们以铁易醋。如果弄到龙涎香, 也以铁易之。他们之间以手势代语, 没有语言。他们擅长游泳。他们有时抢劫商人们的铁, 什么东西也不给。

III. 航船行至箇罗王国。整个海岸都叫巴尔, 是一个扎比基王国, 位于印度国之右, 同受一个国王管辖。(第 19 页) 他们身裹缠腰布, 国王戴沙笠, 下层人穿一件围腰裙。有淡水井, 井水受泉水和雨水影响而消涨。扶南距哈尔干不远, 距箇罗·巴尔一月路程。

IV. 然后, 船到荨麻山 (Tiyūma), 那里有甘泉供装淡水。两地相距十天的路程。

V. 然后, 船向军突弄 (Kundrang) 开去, 十日可至。那里甘泉淙淙, 人人可取。印度群岛也是一样, 打井即有淡

^① 下面段落均由阿拉伯文译出。——译者

水。该地有一山，是奴隶和盗贼们避难场所。

VI. 以后，船行十日到占婆。那里清泉甘甜，盛产苏负沉香。有国王。人种尚棕，身着两块缠腰布。

VII. 装好淡水，启航，十日后抵达昆仑群岛，有甘泉。

VIII. 随后，船向涨海开去。

IX. 然后，船抵中国门。所谓中国门，实为海内群峰。每两山之间都有通道，仅容航船通行。如果从昆仑群岛平安至此，那么，一个月之后，便可到达中国。但是，船要在山峡之中行走七日。越过峡门(第 21 页)进入山湾，有淡水，去中国到此抛锚。此地名叫广府，乃中国的城市和港口。河水溪水充沛，军营商场皆备。一昼夜潮汐两次。

伊本·法基赫在 902 年

I. (第 12 页) 马斯喀特与扶南相距一月的路程。扶南与哈尔干大约相距一个月的路程。

II. 航船离开扶南，向哈尔干进发，过哈尔干，便到箇罗。两地之间是群岛，据说是梭加 (Lanka) 岛，岛民不懂语言，不穿衣服，好似鲛鱼，没见他们之中有女人。他们以龙涎香换铁。他们乘独木舟出海贸易，卖椰子。椰子露，乳白色，饮时味甘如蜜；放一天变为酒，存放多日变为醋，以铁易之。交易之时，以手势代语。他们善游泳。他们可能偷拿商人们的铁块，但不给商人什么东西。

III. 航船以后行至箇罗王国，位于印度国之右，由一个国王统辖，身着围腰布。

IV. 然后船行至荨麻山。那里有甘泉。需走十天才能到达。

V. 然后，船行十日到达军突弄，那里有甘泉。在其它

印度岛屿上也是一样，挖地即出淡水。

VI. 然后到达占婆。

VII. 再往后，船抵达昆仑岛。这是一个海岛，(第13页)船行十日可到。

VIII. 然后到涨海。

IX. 至中国门，即海中群山。每两山之间均有一船可通的甬道。以后至中国。从昆仑到中国，行程一个月。但是航船要在山中行走七日。过了峡门，便有淡水。据说那就是广府，一日一夜潮汐两次。

- 6 以上例证并不是孤立的。伊本·罗斯特的一段内容(第8页)取自巴塔尼^①书；另一段内容(第82—83页)引自伊本·库达特拔书(第170—171页)。马苏第在其《黄金草原》(第1卷，第170—175页)一书中提到的闍婆格王对吉蔑王的征战史也完全是阿布·泽德的翻版。伊本·巴图塔引自伊本·朱拜尔的段落对于我坚持自己的看法更具有说服力。事实上，对于本书所研究的地区，无论是引用原文，也无论是抄袭来的内容，阿拉伯地理学家们的相互抄袭是最常见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后世的作者们所使用的关于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的内容，在德·戈吉(De Goeje)编注的伊本·法基赫写本中没有出现过。因此，如果承认这样的内容是正确的，那末这些引语就会起到特殊的作用。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我觉得在不具备排除疑问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内容是不谨慎的。

^① 见《巴塔尼天文书》，拉丁文译本，米兰1899年版，4开本，第26页。

字母的对音法

对于在法文中没有对应的音素，我采用的是下列转写法：

阿拉伯文对音方法

两个摩擦的软腭音由 kh 和 gh 所代替。

摩擦浊辅音由 ḡ 代替，而摩擦清辅音则由轻音符(')代替。

加强语气的 q、t、s、d、z 等音素分别由 k、t、s、d、z 等所代替。

腭化清辅音 j 由 dj 代替，古代的腭化浊辅音 ḡ 由 ċ 所代替。

摩擦齿音 j 由 dz 代替，而齿间摩擦音则由 th 所代替。

元音字母 l 的转写为：在词首由 a 或 ā 代替，在词中和词尾由 ā 代替。

字母 s 起半元音作用时由 w 代替，起元音作用时由 u 代替。

字母 s 起半元音作用时由 y 代替，起元音作用时由 i 代替。但这一用法在人种学方面的词尾多数用 i 代替，但谁都知道，这里指的是加重语气的半元音：Fārsī 实际上应该是 Fārsīyy，即波斯。

字母 'i 转写为 l，比如 djazāir (群岛)。

“:”符号通常转写为 u，在某种情况下因习惯用法由 o 来代替。

马来文对音方法

阿拉伯—马来文字母 j 转写为 dj，前腭音 ch 转写

为 ċ, 而软腭音 gh 转写为 ħ。

ě 音标在印度尼西亚的各种语言里表示 œ, 是一种例外的情况, 相当于法文“je”中的 e, “veux”中的 eu。一般说来, 该字母爪哇语的名字是 pĕpĕt。

汉文的对音方法

同样的惯例也使用汉文的音素: 涨海 (Tchang-hai), 从音素角度看相当于 Čaṅ-khay, 也就是说, tch=č, ng=ṅ, h=kh, i=y。

在汉文的对音上, 我遵循了伯希和的对音法, 即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对音法, 但为了使某些指示词更为接近, 我不得不根据这部著作所需要的对音法仿造一些汉字发音。比如涨海一词, 古代的发音为 Čankhay, 当代发音为 Šankhay, 无可争辩地来自汉文的涨海。Čankhay 和 Tchanghai 的一致性对一个汉学家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然而如果用相应的发音 Čan-khay 表示习惯的涨海一词之拼写, 则是一目了然的。

阿拉伯文外来名称的对音形式

阿拉伯字母 j, ṣ, k, q, i, n, b, f 等常常在印度洋地区阿拉伯化的姓名和地名中出现, 具有转写的价值, 其中前两个字母肯定可以复原到古时的发音形式。

字母 j 是一个腭化了的浊辅音, 过去发 g 的音, 现在发 dj 的音, 有着从喉音转为浊辅音和清辅音的功能, 例如:

岛屿, 过去发音 Guzra, 现代发音 Djuzra <梵文的 Gujra;

翟折罗国, 过去发音 Gurzan, 现代发音 Djurzān, <波

斯文的 Gurdjān;

僧祇,过去发音 Zang, 现代发音 Zandj < 波斯文的 Zang;

郎婆露斯群岛,过去发音 Langabālūs, 现代发音 Langzbālūs (=Nicobar);

柚木,过去发音 sāg, 现代发音 sādj < 梵文的 Čaka;

椰子果,过去发音 naringil, 现代发音 narindjil < 梵文的 narikela。

字母 j 起腭化浊辅音作用,可转写为:

1. 梵文的腭化浊辅音和腭化清辅音:

乌贾因 (Udjayn) < 梵文的 Ujjayini;

布罗奇 (Barūdji) < 梵文的 Bharukaccha。

2. 相邻近的音素,如马来语的 dj 和班图语的 dy:

閩婆 (Djāwa) < 马来语的 Djāwa, 一般来说指苏门答腊岛,也有时指爪哇岛;

翁古迪亚 (Unkūdja) < 斯瓦希里语的 Ungūdyā, 即桑给巴尔;

昂戈吉迪亚 (Ankazidja) < 科摩罗语的 Angazidya, 即大科摩罗群岛。

3. 突厥文和汉文中腭化浊辅音 č:

汉人 (Djikil) < 突厥文的 Čikil;

巴格拉吉 (Baghrādji) < 突厥文的 Bagrač;

别切内克人 (Badjnāk) < 突厥文的 pāčānāg;

巴扎人 (Badjā) < 突厥文的 Bačā;

交趾 (Kawdji) < 汉文的 kiao-tche, 指东京湾;

扬州 (Yandjū) <汉文的 Yang-tcheou;

9 苏州 (sūkdjū), 来自汉文的 Sou-tcheou。

〔有关古阿拉伯文č > š 之间的复原问题,国立现代语言学院教授玛塞尔·科恩 (Marcel Cohen)非常盛情地向我指出:“这一现象在所有的闪语族中都相一致,它清楚地说明,这一阿拉伯文字母始终是一个起加强语气作用的摩擦清齿音。所以似乎不该承认字母 š 从未读作 č。”但这种观点仅能从形式上改变我的结论,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在用阿拉伯文转写的大部分地名和其它外来词汇中都带有 š,这一表示加强语气的摩擦音代表着外来声母 č,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罗列的十二个例证非常清楚地证明的那样。大食人为什么要用表示加强语气的清摩擦齿音 š 来翻译外来语中的清腭音 č,而不使用浊腭音 dj 或摩擦腭音 š 呢?因为前者是一个非常接近原阿拉伯文发音的字母,而后者也可以用摩擦齿音 š 来代替。这是现在已经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笔者本人将于下文再回头来谈这一问题。〕

当代用来发“嘘嘘”音的摩擦音 š,乃过去腭音转化而来的,请看下面例证:

乌浒 (Čūl) <突厥文的 Čöl;

科费 (Kofč) < kōfič, 指克尔曼人;

乌浒族 (Čūl) <突厥文的 Čöl, 指乌浒水 (Oxus) 地区的突厥部落;

索艾尼延 (Čaghāniyan), 即吐火罗斯坦 (Tokhāristān) 城;

秦成支那 (Čin) <梵文的 Cina, 印度语的中国;

占婆 (Canf) <梵文的 Campā;

布罗奇 (Barōč) <梵文的 Bharukaccha, 英国地图上标明的是 Broach;

珠利耶 (Čuliyān) <梵文的 Cola, 即科罗曼德尔 (Coromandel);

绳拂 (Čamar) < Camara;

檀香 (Čandal) <梵文的 Candana;

婆鲁师 (Balūč), 婆鲁师斯坦 (Balūčistān) 当地土语的叫法;

涨海 (Čankhay), 中国海西部。

上述各词现在的发音分别为: Šül, Kofš, Šül, Šaghā-niyān, Šin, Šanf, Barōš 或 Barūš, Šūliyān, Šamar, Šandal, Balūš, Šankhay。

从以上发音事例中可以看出, 现代阿拉伯文中活动的摩擦音 š 是由过去的腭音 č 演变来的。阿布尔菲达说: “木鹿 (Merv) 的一个村庄, 其名字为察罕 (过去发音为 Čaghān, 现在发音为 Šaghān), 其波斯文形式是 Djāghān, 后来又阿拉伯语化了。”这就说明, 波斯文 Djāghān 一词的阿拉伯文形式是由来已久的。这种转写开始自字母 č 为腭化浊辅音的时代, 后来变为近似波斯文腭化清辅音的 dj。因此可以说波斯文字母 dj 转化为阿拉伯文字母 č, 再转化为现代的发音 š。又比如比鲁尼书中的 Djaymūr^① 一词, 10

① 见雷诺: <有关印度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新残卷>, <亚细亚学报> 1844年8—10月版, 1845年2—3月版, 第91页和121页以及萨肖 (Sachau): <阿尔比鲁尼的印度>伦敦1910年版, 第1卷第209页。